

CAMBRIDGE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
历史

[英]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
历史

[英]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窃历史/(英)杰克·古迪著;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308-06518-4

I. 偷… II. ①杰…②张… III. 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9476 号

The Theft of History 1st edition (ISBN 978-0-521-87069-6) by Jack Good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
得出口。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09-12 号

偷窃历史

(英) 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策划编辑 景 雁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徐 婵 杨苏晓

装帧设计 高海云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518-4

定 价 48.00 元

致 谢

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已经提交过本书一些章节的内容：例如，在美因茨提交了有关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论文，在蒙特利尔和柏林提交了关于布罗代尔（和韦伯）的论文，在亚历山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交了有关价值观的论文，关于世界史这个觉见性主题曾在伦敦的比较史研讨会上提出，此外，在卢萨·帕塞里尼组织的研讨会、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鲁特的美利坚大学、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伊斯坦布尔的比尔基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中则发表过论爱情的文章。

本书的确是温顺之辈所害怕探讨的，它是“野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驯服思想”的产物，它涉及我早年感兴趣的很多方面。在此，我要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朱丽叶·米契尔（不仅给我思想上的启发，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彼得·伯克、克里斯·汉、理查德·费什、乔·麦克德莫特、狄克·惠特科，还有很多其他人，包括我的儿子罗卡米特。同时，我还要向苏珊·曼斯菲尔德（组稿）、莫拉尼·哈勒（录入）、马克·奥弗德（录入和编辑）、曼努埃拉·韦奇伍德（编辑）和彼得·休顿（汇编）致以诚挚的谢意！

导 论

“偷窃历史”这个标题是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大陆一直认为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制度，诸如民主主义、重商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但这些制度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也都能找到。我觉得像某些情感诸如爱情（即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情感一直被认为只是从12世纪的欧洲才出现，而且还被视为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比如城市家庭）。

如果我们看看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Trevor-Roper）在《基督教欧洲的兴起》一书中的说法，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特雷弗-罗伯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虽然有些比较史学家将这一优势仅从19世纪算起）。并且，他认为这些成就由欧洲大陆单独取得。尽管这一优势可能只是暂时的，但他提出：

新的世界统治者——无论他们可能是谁，都将继承欧洲，而且仅仅是欧洲所创建的局面。正是欧洲的技术、欧洲的先例、欧洲的思想引导了非欧洲世界与其过去诀别——非洲摆脱了野蛮，亚洲也告别了更为古老、缓慢和更为庄严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部欧洲史。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为此辩护。^①

^① Trevor-Roper, 1965: 11.

特雷弗-罗伯还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检验它（他的哲学），历史学家必须涉猎海外，甚至是敌对的国家”。但我认为，特雷弗-罗伯并没有涉足欧洲以外的国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的。此外，当他相信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实际优势时，他采取了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欧洲的成就归功于一个事实：基督教世界“自身拥有一种全新的、旺盛的活力”。^①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特雷弗-罗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我想指出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更极端的思想倾向，这些倾向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两大洲历史的理解，也妨碍了人们对整个世界史的理解。

在非洲“部落”和加纳这个简单王国里居住了数年之后，我开始质疑那些宣称欧洲人“创造”出了政府形式（民主制）、亲属关系（核心家庭）、交换方式（市场）和司法形式的观点，至少这些事物在其他地方从一开始就广泛存在。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的学科中，还是在普通大众谈论的话题中，这些观念都在历史中有所体现。诚然，欧洲在近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点是必须说明的，但是，这些成就很多也应归功于其他一些城市文化，比如中国。实际上，东西方之间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分歧只在近代才体现出来，而且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分歧。然而，在许多欧洲历史学家看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轨迹被视为一种不同的发展进程（一种极端的观点将其形容为“亚细亚专制”），这一进程与我对其他文化和早期考古学（文字出现前后）的理解背道而驰。而这本书的目的便是，通过重新检视欧洲历史学家所理解的自公元前三千多年前青铜时代

^① Trevor-Roper, 1965: 21.

就开始的基本的社会转型方式，来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抱着这种想法，我反复研读了一些我非常敬仰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布罗代尔、安德森、莱斯利特（Laslett）和芬利（Finley）。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我对包括马克思和韦伯在内的学者们理解世界历史的方式进行了批判。进而，我试图引入一种更广阔的、比较的视野，切入人类生活公共和个体特征的讨论，切入市场和非市场活动以及民主和专制的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西方学者用一个非常狭隘的框架来阐释文化史问题。当我们讨论古典时代和西方的早期发展时，忽略人类学家专门指出的早期（“小型”）社会问题是小，但对亚洲主要文明的忽略，换言之，对欧洲概念中“亚细亚国家”的忽略，将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反思亚洲，也要反思欧洲的历史。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² 赞同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的观点，认为东方文明的建立比西方文明更为牢固。东方有着“稳定的文明，这一文明有着很深的根基，以致文明在改朝换代中仍能持续不断”。^①但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几乎都不同意这个观点。

因而我的观点便是人类学家（或比较社会学家）对“现代”历史的回应。我读过戈登·希尔德（Gordon Childe）和其他一些史前史学者的著作，他们描述了青铜时代亚洲和欧洲文明大致平行发展的状况，那么，我所提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便是：为何许多欧洲学者设定从古代开始，两大洲的发展就大不相同，以致最终导致西方“创造”了“资本主义”呢？对早期分歧仅有的讨论限于东方部分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方面，但只是作为西方雨水浇灌体系的对比。^②

① Trevor-Roper, 1965: 27.

② Wittfogel, 1957.

而正是这一讨论忽视了东西方的很多相似点。这些方面起源于青铜时代，比如犁耕农业、畜力牵引、城市手工业和其他一些特殊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字的发展和因此带来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当然还包括我在《文字逻辑和社会组织》（1986）中讨论的其他文化方面的很多作用。

我认为，只看到生产方式中相对有限的差异是错误的，因为东西方在经济、交往方式和包括像火药的最终使用这样的破坏形态上都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相似，包括家庭结构以及更普遍的广义文化，都在“东方的”的前提下被撂在了一边，而这种假设强调的正是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轨迹。

对比非洲时，欧亚在生产、交往方式和破坏形式上的诸多相似点变得越发明显，但当“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不加区分地随意使用时，这些相似之处又经常被忽略。特别是，有些学者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很大程度上非洲依赖锄耕农业文化而不是犁耕和复杂的灌溉体系，它从未经历过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但非洲也不是与世隔绝的。阿善提王国和西部苏丹盛产黄金，这些黄金和奴隶穿越撒哈拉沙漠，一起被运往地中海。这有助于安达卢西亚和意大利的城市与东方进行货物贸易，因为欧洲急需贵金属。^①反过来，意大利则给他们送去威尼斯的玻璃珠、丝绸和印度棉花。一个活跃的市场将锄耕经济和早期商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一边是南欧的雨水浇灌农业经济，另一边则是东方的灌溉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经济。

除了欧亚之间的联系以及欧亚模式与非洲模式之间的差别外，欧洲和亚洲大多数社会中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相似之处也使我大为惊

^① Bovill, 1933.

讶。与非洲的“彩礼”（说得更明白一点叫“聘金”）相比——一般是新郎家给新娘家财物，或者为新娘家效劳，亚洲和欧洲的情况则是，无论是通过继承还是婚配嫁妆，父方的财产都要分配一部分给女儿。欧亚间的这种相似之处，是两者在风俗制度和态度观念上广泛的并行不悖的主要部分。两者的平行性也削弱了学院派一些学者在家庭史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努力——他们一直极力突显16世纪以来英国出现的“欧洲”式婚姻模式的特征，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将这种差异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是值得怀疑的，而对西方与他者区别的过分强调则显得有些种族中心主义。^①我觉得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想尽量避免种族中心论（就像规避目的论一样），但他们却几乎很少能做到，因为他们对其他地区（包括自己的早期阶段）的了解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也往往导致他们对西方独特性的主张难以立足，或隐或显。

随着对欧亚文化的其他方面了解得越透彻，以及对印度、中国和日本地区的体验越多，我就越发现，大国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或者说欧亚的各种文明需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理解。而那种方式恰好寓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亚细亚例外论、理性的不同形式、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等人们不可能去思考的概念，这些通过概念区别阻碍了对“理性”的追求和比较。欧洲有历史分期（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其他地区（其他任何地区）则没有。差异当然是有的，不过，我们所要做的是对东西方更细致的比较，而不是粗略的对比，因为粗略的对比最后总是后者沾光。^②

我在本书开篇想要指出，几乎很少有人提出分析性观点。我认

① Goody, 1976.

② Finley, 1981.

为，人们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不满。首先，假定以
4 体验者为中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共同体，围绕体验者组织材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这种倾向导致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希腊罗马的特征，也是其他共同体的特征。所有人类社会都表现出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这是社会成员对个人和社会认同的部分条件。种族中心主义并不单纯是欧洲人的毛病，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是它的两个变种。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人（The Navaho）自称为一个“民族”，这与种族中心主义没多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我欣赏种族中心主义在凝聚力方面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接受这些观点的原因。这些偏见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像伯纳尔（Bernal）^①对待古希腊的态度那样；也可能根植于17、18世纪，像霍布森（Hobson）^②对欧洲的态度那样，因为他们貌似为了简化历史而将一些特殊情况普遍化了。古希腊不是“亚细亚”的好情人，罗马人歧视犹太人，^③理由不尽相同。犹太人将他们置身于宗教思想中，罗马人亲近资本和文明而走在了前列，当时的欧洲人以此为基础在19世纪获得了成功。所以，隐藏的种族中心主义危险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屡屡掉入的陷阱。但如果欧洲并没有像我将要讨论的那样创造爱、民主、自由或者市场资本主义，那么，也可以说它没有创造种族中心主义。

不过，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却在一个既定事实下得到强化：在古希腊广泛运用的字母文字系统所源发的权威的强化作用下，欧洲古

① Bernal, 1987.

② Hobson, 2004.

③ Goodman, 2004: 27.

典时代某种特殊的世界观融入到欧洲历史编撰的论述中，表面上科学地遮掩了隐藏在普通现象的个别情况。本书的第一部分将集中分析与历史因果关系、历史编年相关的观点。

其次，弄清欧亚之间根本分歧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将非常重要（我将主要讨论古典时代）。^①近代欧洲的大事件、欧洲在不同领域对世界的早期统治加剧了早期的欧洲中心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取得了世界支配地位，部分是通过文艺复兴，凭借坚船利炮^②的优势。这些使欧洲得以探索和开拓新的疆土，发展商业机构，恰如印刷术的运用为知识的推广做好准备一样。^③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取得了对全球经济的实际控制权。在这种控制的背景下，种族中心主义在任何地方都开始呈现出更具侵略性的一面。“他族”自动地成为“更少的民族”。在欧洲，一种非常世故的学问便是制造为何应该如此的种种理由（有时还可能是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者的语调，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从文化而不是生理上的优势来加以考虑）。有人认为，上帝，亦即基督教的上帝，或是新教使欧洲选择了这条道路。很多人都赞成这种看法。正如一些学者所坚持的，这种统治权需要解释，但长期以来对基本因素的解释——无论是种族的还是文化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分岔只是近代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警惕以一种目的论形式的历史解释，也就是说，从现在的立场出发解释过去，将目前的优势推到古代时期，而且，相比表面的辩解，这种解释更多是从“精神”层面上进行。

① 这一点与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关于东方主义的争论有关，参阅Gellner（1994）。

② Cipolla, 1995.

③ 这一优势受到霍布森（2004）的质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的扩张不仅在美洲取得胜利，也在东方大胜。在东方，它超越了印度和中国的成就。同时参阅Eisenstein（1979）。

目的论模式简洁的线形观囊括了非欧洲地区的一切事情，却遗漏了古代，它使欧洲历史自身陷入一种不确定的进步变化的叙述中。这种线形发展观不得不被另一种历史编撰学所代替，这种历史编撰学对时代分期划分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认为欧洲在前现代时期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并将欧洲历史与青铜时代城市革命中的共享文化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看到欧亚之间随之而来的历史乐章有着一系列的鲜活特征和持续的、多方面的、相互影响的联系，尤其是思想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动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将更广范围的社会发展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为相互影响的、逐步演化的进程，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纯粹的欧洲大事记。

最后，世界历史一直被那些始终将欧洲铭记在心的或专业或业余的历史学家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分类方式所主导。也就是说，一种“进步”的时段划分为了自身目的而突出欧洲特殊6 轨迹的历史背景。^①因此，封建主义本质上是欧洲的，说明这一点毫无困难。尽管连库尔本（Coulbourn）这样的学者也尝试过使用比较的方法，但依旧是从西欧开始，最后又回到西欧。这并不是比较法从社会学意义上如何研究的问题。如我要表明的，人们必须从单独的土地所有权等特征开始，建构多种类型的特征图式。

芬利研究奴隶制关系时采用的网状方法对考察历史形态的差异不无裨益。鉴于奴隶中间可能有很多等级，他采用了多种奴隶阶层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奴隶制，比如农奴、佃农和雇农，而不是简单的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②讨论土地所有权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难

① 参阅Marx and Engels, 1969: 504.

② 参阅Bion (1970) 一书的扉页和第3页。也可参阅Bion (1963)，书中提到图式的概念已被用于解释心理学现象。

题，因为通常只是粗略地分为“个人所有”和“公共所有”。梅因（Maine）认为“权利阶层”也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分散在社会的不同阶层，这一概念使我们避免了那些错误的立场，也使我们以一种更复杂、更生动的方式去考察人类状况。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分析西欧和土耳其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而不用担心过早卷入像“欧洲有封建主义，土耳其没有”这样草率的误断中。蒙蒂（Mundy）等人认为，土耳其和欧洲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①用这种网状图式，我们便可探询人们所预测的世界未来的发展结果是否存在很多差异，而不再需要应付以非比较、非社会学的方式所形成的单一概念。^②

当我开始探讨这一主题时，全球史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很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布劳特（Blaut）^③强调这些曲解是由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造成的。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Gunter Frank）^④彻底改变了他对“发展”的看法，呼吁我们“重新面向东方”，重新估价东方。汉学家彭慕兰（Pomeranz）在他所说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⑤中提出了一个学术总论，认为“大分流”仅仅是从19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在此之前，世界主要地区都存在可比性。政治学家霍布森最近在《西方文明中的东方源流》一书中也作了全面论述，试图表明东方的主要贡献。^⑥费南德兹-阿梅斯托（Fernandez-

① Mundy, 2004.

② 虽然我提到的这种社会学比较法，但很少有社会学家能运用这种方法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制度。人类学家也没有做到，尽管我认为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一直在坚持这种方法。这两种学科总是质疑东西方的比较。或许，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年鉴》最可能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案。

③ Blaut, 1993, 2000.

④ Frank, 1998.

⑤ Pomeranz, 2000.

⑥ Hobson, 2004.

Armesto) 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讨论, 认为欧亚主要国家之间两者平行发展了一千年。^①另外, 越来越多的文艺复兴研究者, 像建筑史家德博拉·霍华德 (Deborah Howard)、文学史家杰里·布罗顿 (Jerry Brotton), 他们都强调近东在促进欧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正像许多科技史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 东方对西方后来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③

我的目的是要展现为何欧洲不仅简单地忽视或削弱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 结果也误解了自己的历史; 而且还要表明这种历史概念和历史分期如何妨碍我们对亚洲的理解, 而这种方式对理解过去和未来都同等重要。当然, 我并不打算重写欧亚大陆的历史, 我的兴趣在于如何矫正我们从所谓的古典时代看待历史的发展方式, 同时也是矫正欧亚和其他地区的关系。我试图表明, 从总体上重新讨论世界史是富有成效的。我将这一讨论限制在旧大陆和非洲地区。以亚当斯^④为代表的其他人, 已经就城市化这样的问题比较了新旧大陆。这样的比较将会产生很多主题——“文明”发展中的贸易和交流, 但它也会因为发展理论的重要结论而明确要求更多强调内部的社会演进, 而不是商业或其他衍生问题。

我的总目标类似于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探讨文艺复兴时的目的, 只是我从古典时代开始。伯克写道: “我试图重新考察西方文明兴起的宏大叙事。”他将这种“叙事”看作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描述”, 文艺复兴是整个进程链条中的重要连接点, 当然, 这条链条还包括宗教改革、科学

① Fernandez-Armesto, 1995.

② Howard, 2000; Brotton, 2002.

③ 参阅Goody, 2003.

④ Adams, 1966.

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①在伯克对文艺复兴的最新研究中，他试图将“西欧文化看成诸多文化的一种，与它的邻居——著名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共同存在并相互影响，两者也都有它们自己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复兴’”。 8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审视欧洲一种类似于阿拉伯圣训传述世系观念的有效性，这种社会—文化系谱学从古典时代、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一直贯穿始终，并将亚洲作为“例外”、“专制”或者倒退而搁置一边。第二部分考察三位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试图将欧洲与世界相比，但却仍然认为设定的这条独特发展线路是具有优势的。这三人分别是李约瑟，他展现了中国科技的杰出性；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他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中文明进程的根源；还有一位是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无疑，他们都流露出可怕的目的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当然，我这样做是为了指出即使如此盛名的历史学家也会掉入这样的陷阱。第三部分考察了包括学者和门外汉在内的许多欧洲人的观点，他们成为某些值得重视的制度机构的忠实捍卫者，例如城市、大学、民主本身这些特殊形式，以及各种价值观的维护者，诸如个人主义还有诸如爱情（即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之类的情感。

对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在欧洲中心论的言论中往往是刺耳的，时不时还会激起一些埋怨。我将努力避免这种论调，集中论述我在此前一些讨论中提出的事实性问题。只是，来自另一方的声音往往声势如此浩大，如此确信，以致我们的声音或许可能会因为要养家糊口而被谅解吧。

^① Burke, 1978: 3.

目 录

1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系谱学

- 第一章 谁偷了什么？时间与空间 /3
-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创造 /19
- 第三章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还是欧洲的瓦解与亚洲的主宰？ /72
- 第四章 亚细亚专制，土耳其或其他地区？ /110

2 第二部分 三种学术视野

-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科学和文明 /143
- 第六章 “文明”的盗窃：
埃利亚斯与绝对主义欧洲 /179
-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盗窃：
布罗代尔与全球比较 /214

3 第三部分 三种制度机构和价值观

- 第八章 机构的盗窃：城市和大学 /257
- 第九章 价值观的盗用：人文主义、
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 /291
- 第十章 偷来的爱情：欧洲的情感诉求 /323

结语 /348

参考文献 /373

索引 /399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系谱学